

顧頽剛

古史論文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第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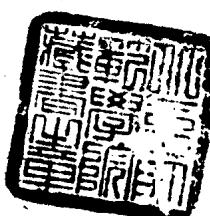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8065

1168065



責任編輯：駢宇齋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第一冊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順義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12<sup>1</sup>/<sub>2</sub> 印張 • 254 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7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481 定價：3.90 元

ISBN 7—101—00023—1/K·10

## 前 言

顧頡剛先生，一八九三年出生於蘇州的一個書香世家。孩提時，他的祖父就教他識字。五歲，開始讀四書、五經。六、七歲時，自己就能閱讀唱本小說和簡明古書。祖父帶他出去時，就隨處給他講故事，使他自幼對歷史就感到深厚的興味，並得到初步的認識，知道凡是眼前所見的東西，不是古代早已盡有，也不是到了現在剛有，而是慢慢地積累起來的。童年的這些歷史認識，是他後來創立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的萌芽。

顧先生的疑古思想是繼承鄭樵、姚際恆和崔述的傳統的。他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中說：

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恒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鄭樵的書啟發我做學問要融會貫通，並引起我對詩經的懷疑。所以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敢于打倒「經」和「傳、記」中的一切偶像。

他的治學方法和對今、古文的看法則來自胡適和錢玄同。他說胡適給他以研究歷史的方法，使他對古史有特殊的瞭解，知道「不但要去辨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錢玄同則使他「辨清了今、古文家的真面目」。（秦漢方士與儒生序）所以他說：

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于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和幫助。（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

這就是顧頡剛先生的主要學術淵源，但他也受到王國維用實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的深刻影響。羅振玉和王國維的著述，開闊了他的眼界。他認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新真相，可以用來建設真古史，而它正好又反映出書籍中所寫的古史是幻相，所以又可用來作為破壞偽古史的工具。

但是把顧先生引上考辨偽古史道路的却是康有為，一九一四年，他讀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對孔子改制考中所說的「上古史事茫昧無稽」，深受影響，引起他對於古書上的古史不信任的觀念，就有志於推翻偽古史。這年三月，他寫的古今偽書考跋，是他最早寫的辨偽文字。到冬天，他開始寫讀書筆記，以記錄蒐集到的材料和對古史的見解。他又細讀了夏曾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對書中總稱三皇、五帝的時代為「傳疑時代」，直到周武王滅殷，才稱為「化成時期」，很為贊賞，以為處處以科學眼光觀察，發明精義，讀而忘倦。一九一七年，胡適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哲學史」，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胡適這樣的截斷，顧先生非常佩服他的魄力，更堅定了他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

顧頡剛先生之所以敢于在五四運動以後，「離經叛道，非聖無法」地懷疑古書上關於古史的記載，是因為他得到了社會學、考古學和歷史進化論的知識，知道社會進化有一定的階段，而戰國、秦、漢以來的古書中所講的古史却和這些科學知識格格不入。由于他深信這些科學知識是真理，所以敢于冒

天下的大不變向二千餘年來的傳統觀念挑戰，敢于用考證的方式來推翻經書上的偽古史。當他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揭露了我國先秦至兩漢的古書上有關古史記載的神話傳說的真面目，剝去了「經書」的神聖外衣，從根本推翻了二千多年來人們崇信的偶像，就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注目，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因此顧先生的疑古辨偽，不僅具有創造性的重大學術價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重大社會意義。

顧頡剛先生對古史研究的貢獻，主要是揭示出戰國、秦、漢以來的古書，特別是「經書」上所載的古史，大多是出于神話傳說的演變，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積累起來造成的，從而把充塞在古史中許多虛妄的偽史料清除出去，為科學地研究我國的古代史掃清了道路。下面就從四個方面來說明顧先生在考辨古史上的貢獻。

## 一、創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

創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是顧頡剛先生研究古史的重要貢獻。這個古史觀的產生，他在《答柳翼謀先生一文中說：

我對於古史最早懷疑，是由堯典中的古史事實與詩經中的古史觀念相衝突而來。在這個衝突中，中樞的人物是禹，所以使我對於禹在傳說中的地位特別注意。從此旁及他種傳說，以及西周、東周、戰國、秦、漢各時代人的歷史觀念，不期然而然在我的思想中理出了一個古史成立的系統。

一九二二年，顧頡剛先生在起草最早的上古傳說一文時，把詩、書和論語三部書中的古史觀念作比較，發現禹的傳說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的傳說是到春秋末年才產生的，這個古帝的傳說越是後起，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禹又是晚輩了。于是他就立了一個假設：

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這個假設的意思是說：戰國、秦、漢以來的古書中所講的古史系統，是由先後的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積累起來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和古書中所講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次年，他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前記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說這有三個意思：

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

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

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範了。

第三，我們在這上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情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胡適以為「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並說明用這個觀念來考辨古史傳說，其方法可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1) 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 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3) 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爲複雜，由陋野變爲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爲全國的，由神變爲人，由神話變爲史事，由寓言變爲事實。

(4) 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爲了從雜亂的古史中分出信史與非信史，顧頡剛先生在答劉胡兩先生一文中又提出要打破四項非信史的基本觀念：

- (1) 打破民族出于一統的觀念；
- (2) 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 (3) 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 (4) 打破古史爲黃金世界的觀念。

以上就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的大致內容。這個觀念導源于崔述的「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補上古考信錄卷上），「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考信錄提要上）之說。但崔述只是看到了這些表面現象，沒有去深究，而且由於時代的局限，也不可能透過現象去深究它內在的規律性東西。因此他只能停留在感性認識而不能上升爲理性認識。過了一百多年，顧頡剛先生承擔了這一歷史使命，創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揭開了「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繁」的內在秘密。因此它既是中西文化結

合後長出來的碩果，又是我國歷代考辨古史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規律性總結。它的出世是我國辨偽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性的發展，標誌着我國的疑古辨偽之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顧頡剛先生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發表以後，即從事於古史傳說的各種具體問題的考辨，後來就再也沒有回過頭來對這一史觀作深入的系統的闡述。因此其內容的表述還有不够完善之處，但任何東西，不可能一開始就十全十美的，因此其疏畧之處，正是需要後來的考辨古史的學者繼續充實、發展和提高的。

## 二、探索古史傳說的演變

顧頡剛先生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扼要地論述了古史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的由來，他說：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時人對於古代原沒有悠久的推測，詩、書裏的「帝」都是上帝。商族認爲禹爲下凡的天神，周族認爲禹是最古的人王。古史傳說中的帝王，東周的初年只有禹，是從詩經上可以推知的，東周末年更有堯、舜，是從論語上可以看到的。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一次連稱舜、禹，可見當時確以爲堯、舜在禹之前。於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堯、舜。從戰國到西漢，偽史充分地創造，在堯、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從秦靈公於吳陽作上畤，祭黃帝，經過了方士的鼓吹，於是黃帝立在堯、舜之前了。自從許行一輩人抬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黃帝之前了。自從易繫辭抬出了庖犧氏，於是庖犧氏又立在神農之前了。自從李斯一輩人說「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

更立在庖犧氏之前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揭示了歷來公認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統是由神話傳說層累地造成的。

一九二九年，他在燕京大學教中國上古史時，編著了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把詩經、論語、孟子、堯典、荀子、國語、左傳、楚辭、山海經、呂氏春秋、莊子、淮南子、漢書藝文志、五帝德、帝繫、世本、春秋繁露、史記、易傳、世經、月令、纖緯、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孔子家語五帝篇和潛夫論等書中所載的古史傳說，分為「儒家以前的記載」、「漢以前的儒家記載」、「戰國、秦、漢間的非儒家的記載」、「西漢時的儒家記載」、「劉歆的歷史系統」、「纖緯的歷史系統」、「世經、纖緯以後各以己意整理出來的歷史系統」等七個大類，從它們發生時代的先後尋出它們承前啟後的痕迹，又從它們的發生時代的背景求出它們異軍突起的原因，并觀察它們起過什麼樣的變動，以推翻它們的史實地位而恢復它們的傳說地位。以後他又把講義擴充，寫成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和三皇考兩篇論文，詳盡地論述了戰國、秦、漢間三皇、五帝演化的歷史。又用通俗的體裁寫成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深入淺出地說明了歷來公認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統的由來，文字生動活潑，引人入勝，成為學術界公認的一本論述漢代學術與政治關係的名著。

他還對古史傳說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作了深入的考辨，提出新的看法。在禪讓說起於墨家考中，提出儒家所盛傳的禪讓故事，是由墨家流入儒家的。他說：「禪讓說裏的舜、禹都是從庶人出身的，這件

故事若果真是儒家所造，在儒家的親親貴賤兩個主義之下，哪裏會有庶人出身的天子？這是不待辨而自明的。「禪讓說是直接從尚賢主義裏產生出來的，倘若沒有墨家的尚賢思想，就決不會有禪讓的傳說。」因此，「禪讓說是墨家爲了宣傳他們的主張而造出來的」。但「墨家只提出了堯、舜的禪讓，舜、禹禪讓的故事乃是後人加添上去的」。

關於舜的故事，顧先生說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牽涉到大量的古書、古蹟、古制，使得人頭暈眼花，不易一一查明，他就借着清末宋育仁的虞初小說的回目，寫成虞初小說回目考釋一文，找出它所依據的資料，并加上解釋和評判，揭示了舜的許多事跡都是由神話、故事移入歷史的。

禹的來源，顧先生原先據說文中的「禹」字的解釋，假設爲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後來由于知道說文的「解釋並不足以代表古義，也便將這個假設丟掉了」。（答柳翼謀先生）不過他晚年仍堅持禹爲動物之說。一九五四年他寫的一條高山族之蛇圖騰（法華讀書記第二十一冊）筆記中說：

自平伯紅樓夢研究受批判，時有人詆禹爲一條蟲之說。案予謂禹爲蟲，原本說文，「蟲」爲動物總名，非軟體動物之專名也。近在中央民族學院見臺灣高山族之器物，其族以蛇爲圖騰，其器物亦多蛇形之刻縷，或延體於筒，或伸頸於壺，或蟠於人像之兩肩。以此可以推想禹爲夏族之圖騰，其器物刻縷亦必若此。夏器固尚未發現，然觀殷、周銅器，所有盤螭、盤虺紋者，疑即禹圖騰之遺留也。

潘光旦君語予，曾在唐詩中見有「蠶」字，卽拂拂，則禹爲動物固無疑。

顧先生在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書中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一九三七年寫九州之戎與戎

禹一文時放棄了這一假定。他從九州、四嶽的原在西方而提出禹的傳說，產生於西方戎族。禹原為戎的宗神，隨着九州、四嶽的擴大演化為全土共戴的神禹，更演化為三代之首君。接着他又與童書業合寫鯀禹的傳說，解剖鯀、禹傳說的來源與其演變。在詩、書中，禹的地位是獨立的，事蹟是神化的，禹是禹，夏是夏，兩者間毫無交涉。一直到戰國以後的文籍裏，禹才是夏代第一君主。在山海經和天問等記載原始神話的書裏，已把鯀、禹說成父子，鯀與夏發生關係也始於國語和左傳。自從鯀、禹與夏代發生了關係，夏代史的首頁方才寫成。關於鯀、禹治水，以前相傳都以爲鯀用堙的方法以致失敗，禹改用疏的方法得到了成功。其實這個傳說，起初都說鯀、禹治水用的都是同一的「堙」、「填」的方法。鯀的失敗，是由於「不待帝命」，而不是「堙洪水」。到了戰國以後才出現鯀防洪水而失敗，禹疏洪水而成功的說法。所以會這樣改變，是由於戰國時出現了防洪築堤和疏水灌溉兩種辦法，築堤害多而利少，疏水有利而無弊，由此防洪水的故事便漸歸了上帝所殛的鯀，而疏洪水的故事就歸了上帝所興的禹。晚年，他又寫了息壤考，對於鯀、禹以息壤治洪水的先期神話，作了新的考辨，并對鯀、禹治水故事的演變作了進一步的論述。

與童書業合作的夏史三論，是論述啟和三康（太康、仲康、少康）的故事的演變的。三康的傳說從啟分化而出，少康中興的故事是東漢人造出來的。因此這種傳說不能是古代的史實。聯帶又敘述五觀和羿、澆等故事的演變，指出五觀的傳說與扈、觀有闕；羿的傳說在先秦、西漢時非常紛歧，到西漢中葉以後才漸漸統一，澆的傳說與象的傳說有關。

對商代的紂王，他寫了一篇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說明紂的罪惡也是層累地加上去的，在尚書（除偽古文尚書）中，紂只是一個糊塗人：他貪酒、不用貴戚舊臣、登上小人、聽信婦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他的七十條罪惡是從東周到西漢陸續增加上去的。因此，從這裏可以知道古代的史實完全無異于現代的傳說。接着他又寫了一篇宋王偃的紹述先德，以宋王偃的「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的同樣例子，再一次說明古代史實很多出於傳說，不能輕信。

顧頡剛先生破壞不可信的偽古史，並不是否定古代史，而是還偽古史的神話傳說的真面目，所以抗戰時，他在雲南大學講授中國上古史時，就把偽古史還原爲神話傳說，從「中國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及「商、周間的神權政治」講起。可是他在雲大講上古史只有一年，用通俗體裁所編的講義也沒有編完，到「楚莊王的霸業」就中輟了。他把偽古史還原爲神話傳說的真面目的目的，是爲了建設真古史，在這方面他雖沒有作出重大的科學研究，但在中國古代史述畧這篇通俗文章中，扼要地論述了傳說的古史和科學的古史的關係，并在茫昧的夏王國和商王國的成長和發展兩節中把傳說的古史和科學的古史結合起來敘述，體現了他研究古史的心願。

### 三、探索古代的民族和地域

顧頡剛先生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指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那時人只是把本族形成時的人作爲始祖。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又說：商出於玄鳥，周出於姜嫄，任、

宿、須句出於太皞，鄒出於少皞，陳出於顓頊，六、蓼出於臯陶，楚、夔出於祝融，他們原是各有各的始祖。

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中，又列舉華夏族以外的各部落說：當春秋時，居今河北省南部的有白狄，居今山西省南部的有赤狄。以戎爲名的，陝西有犬戎、驪戎、大戎，河北有山戎，湖北有盧戎，河南有陸渾之戎及楊拒、皋皋、伊雒之戎。以夷爲名的，山東有萊夷，江蘇與安徽間有淮夷。姓嬴的有江、黃、徐諸國。姓偃的有六、蓼、桐、英氏及舒蓼、舒庸、舒鳩諸國。不詳其姓的又有州來、鍾離、鍾吾諸國。更往南行，又有羣蠻和百濮。這些部落各有其歷史的文化，也無公認的共同始祖。

春秋以後，越滅了吳，統一了東南，楚東向滅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統一了淮水和長江流域。秦滅義渠和蜀，統一了西北和西南。齊向海上開拓，燕向東北開拓，趙向北部開拓，又統一了許多異族。韓、魏位居腹地，融化了中原諸戎、狄。經過了二百多年的大國攻滅小國，把無數種族併到一起，爲了使它們能融合起來，就用了同種的話來打破各方面的種族觀念。本來楚的祖是祝融，到這時改爲帝高陽（後人說他就是顓頊）了。本來秦是玄鳥隕卵，女修吞而生子，到這時也是顓頊的苗裔了。趙祖非子，非子也是女修之後，秦和趙就同祖了。本來越是純粹南方部族，和諸夏沒有絲毫關係的，到這時也是禹的子孫了。本來匈奴在極北，越在極南，無論如何聯不起來，到這時都成了夏禹的後裔了，禹是被稱顓頊之孫的，那麼越和匈奴也就同祖了顓頊了。田齊自稱舜後，而舜是顓頊的六世孫，他們也就與秦、趙、楚、越、匈奴爲一個系統下的分支了。商、周是兩個很不同的種族，到這時商祖契，周祖后稷，都

是帝嚳的兒子，變成親兄弟，連帝堯也是他們的兄弟。而顓頊和帝嚳，又是黃帝的孫子和曾孫。這樣就出現了唐、虞、夏、商、周同出於黃帝的說法。

晚年，他在周公東征考證中對帝繫的祖先同源說出現的時代作了考證。他說：帝繫的前半篇把歷代帝王的系統從黃帝直貫到周的先世，後半篇則從「顓頊娶于滕隍氏」起轉到了陸終氏，以至楚熊渠封子三人禹王，和鄭語說的「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正是一鼻孔氣。這就表明寫作這篇文章是爲楚取得中原統治張目的。因此，它的出現當在楚能問鼎中原的時期。戰國中期，在秦還沒有稱王之際，楚威王滅越，統一了南方中國，有力量統一中國，所以作家們紛紛爲它裝點，把黃帝、顓頊等大神堆到楚祖吳回、陸終的頂上，使楚的一系和唐、虞、夏、商、周同條共貫，以取得統治中原的法統，因而就把無數族類的祖先鎔化成爲一個整體，這就是帝繫的祖先同出一源說出現的歷史背景。此文還對古代東方的殷族、東夷、祝融、烏夷各族在周代的興亡分合作了詳細的考證。

抗日戰爭時期，顧先生在四川成都時，整理古蜀國傳說，寫了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及其批判，認爲：古代蜀國和中原沒有關係，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是獨立發展的，直到春秋、戰國間才同秦國有交涉。古代巴、蜀史事的記載可信的實在太少，真有傳說背景的，如青陽降居江水，顓頊生于若水，禹生于石紐，實亦無幾，起源也甚遲。真的歷史事實，只有蠶叢等爲蜀王，巴與楚有國際關係兩點。甲骨文裏的蜀，在商王畿內。逸周書裏的蜀，大約和甲骨文的蜀是同一塊地方。春秋經裏的蜀，在今山東泰山縣附近。這三個蜀全在東方，和四川的蜀國無涉。牧誓的蜀，固然和蜀國有關，但依然是漢水流

域的蜀人而不是岷江流域的蜀人。梁州固然指的是四川大部，陝西、湖北的一部，但這是秦滅巴、蜀前後所作的，不足以說明在這個時期以前四川和中原發生過怎樣的關係。

解放初，顧先生寫了崑崙傳說和羌戎文化，一篇十五萬字的長文，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戎的歷史。說明羌、戎至少已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和中原發生關係極早，自甲骨文到詩、書全都有記載。所謂華夏之族不少由羌、戎分出，不過其中進握中原政權的已自居為華夏，而停留在原來地方的則仍稱羌、戎而已。中國正統文化，實在都從羌、戎區域裏發源的，及至傳進了中原然後大大地擴展的。崑崙是他們的宗教中心，這些宗教的儀式傳進了中原，於是有了「封禪」的大典禮，這些宗教的故事傳進了中原，於是有了整整齊齊的一大套中國古史。中國古史人物是由神話人物轉變而來，而這些神話人物則由羌、戎的宗教故事而來。因此，羌、戎的宗教轉變成了中國的古史。

顧頽剛先生認為秦、漢以前的中國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他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指出：「中國的統一始於秦，中國人民的希望統一始於戰國，若戰國以前則有種族觀念，並無一統觀念。」「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關於三代的疆域，他在古史地域中的擴張一文中說：夏代的歷史，就書本上的材料看來，那時的國都有說陽城的，又有說帝丘的，晉陽的，安邑的，反正離不了現在河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的南部，帶着一點兒河北省的南端。因此，史記吳起列傳裏說：「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這個疆域不過佔有了黃河下游一段地方。他們的敵國和「與國」，如窮、寒、鬲、仍、斟灌、斟尋等等都在山

東省，可知那時與夏朝交通的只有濟水流域爲繁密。商滅夏而佔有中原，比較夏代的疆域惟有東北方是添出來的。周人主中原之後，疆域又寬廣了些。左傳昭九年，記周景王的話道：「我自夏以後穆、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這裏所說的東土是夏、商時的中原，北土是商增於夏的境域，西土是周的老家，惟有南土是新闢的。然而巴、濮、楚、鄧，周亦不能有，只表示其聲威所及而已。實際上，周的南境不過到申、呂、許，今河南省南部。

到了戰國，各強國竭力「辟土地，充府庫」，中原小國及蠻夷之地盡爲吞併。他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中說：春秋以後，越滅吳，統一了東南。楚東向滅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統一了淮水和長江流域。秦滅義渠和蜀，統一了西北和西南。齊向海邊開拓，燕向東北開拓，趙向北部開拓，又統一了許多異族的地域。韓、魏融化了中原諸戎狄。這樣地工作了二百餘年，於是春秋時的許多小國家和小部族全不見了，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了統一的大業。可是這時講到五帝的國土，還不過是「方千里」，而始皇的疆域則是「自上古以來未嘗有」的。所以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史記的黃帝四至乃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

對九州與五嶽的由來，他在洲與嶽的演變中說：西周時尚沒有九州的觀念，更不必說殷和夏。自西周之末到春秋時，在今河南省的西部和陝西省的東南部，有個姜姓民族的居住地，喚做九州。大約在春秋中葉，把這小區域的九州放大爲禹迹的九州，奄蓋當時的天下，但沒有確定這個州名及其疆界。